

“精雕细刻”：邓小平大智慧中的小细节

□ 李 琦



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，邓小平为人熟知的风采集中体现在他的大魄力、大胆识、大智慧上，所谓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。但其实，大凡高明的领导者，都不仅拥有超群的胆略和决策能力，也同样要善于全面、周密、细致地做具体工作。

邓小平除了具备“举重若轻”的恢宏气度外，也拥有“举轻若重”的细致功夫。“精雕细刻”，就是邓小平成功处理具体问题的态度和方法。数十年“精雕细刻”地处理具体问题、打磨细节的丰富经验，也是成就邓小平治国理政“大智慧”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1961年10月23日，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中央工作会议与会代表时说过一句话：“过去冀鲁豫的工作比太行热闹得多，太行的工作不够热闹，但是精雕细刻。当然，那个时候太行的工作再加点热闹就好了，但是归根到底它是细致的工作，精雕细刻的工作，很深入的工作，结果得益处大，兵就不跑。”他还说过：“我们的事业总是要求精雕细刻，没有一样事情不是一点一滴的成绩积累起来的。”

在邓小平眼里，“精雕细刻”就是工作要“深入”“细致”“一点一滴”地积累。这种工作作风，是革命成功的关键之一。

以“新兵动员”为例，来看抗战时期邓小平等人在太行是如何“精雕细刻”地做宣传鼓动工作的。动员群众当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他们首先是进行充分的宣传鼓动，以激发群众的热情。具体办法是召集军人家属开会，或者举行军民联欢晚会，“有可能时甚至举行会餐”。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，他们不仅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，还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，这样就拉近了人民军队和群众之间的感情距离，从而也改变了他们“惧怕军队的心理和‘好子不当兵’的观念”。这些都使招募新兵变得更为顺利。

新兵招到了，也不是万事大吉了。新战士昨天还是一个老百姓，有浓厚的家庭观念，不习惯部队生活，不懂得军事技术。为使他们迅速成长为坚强的战士，除了立即加强抗日教育外，还必须进行许多切实而艰苦的工作。比如：接收新兵、开赴前线等环节，都要组织群众举行隆重的慰劳、欢送仪式；了解战士的情况，观察他们的情绪，解答疑问、解决困难；教育老兵不仅不能欺负新兵，还要帮助他

们；伙食和衣物供给等细节也不能马虎。在一份总结征兵经验的报告里，邓小平特别谈到，还要“提倡战士写信回家，告诉自己在部队的愉快生活，宣传家属抗日救国。允许战士家属到营地看望，并给家属以很好的安慰和招待”。总之，要尽量减少新战士的困难和痛苦，使他们感到精神愉快。邓小平认为这些都是“巩固部队的重要因素”。

这些举措看起来十分不起眼，甚至有点琐碎，然而正是这些“一点一滴”、细致入微的细节，成为邓小平做群众工作时格外重视的环节之一。“热热闹闹”也必须有的，如轰轰烈烈的宣传鼓动、欢迎场面，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些对新兵物质上热心的帮助，精神上细致的指导解释、亲切的关怀，包括对家属的嘘寒问暖。采取这种与旧军队抓壮丁截然不同的征兵方式，招到的兵自然不会跑了。

像这样“精雕细刻”的工作例子，在邓小平的经历中还有很多。他本人还回忆和总结过这样的事：“我们禁鸦片烟运动、土改运动，那样大的规模，都不登报，搞得那么细致，搞得那么好，都是在深入细致的工作基础上搞好的。”总之，“一切工作的成绩，都是由一点一滴的细致工作积累起来的”。

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以后，国家政治生活需要邓小平作更多的宏观思考和决策，不可能再在一些具体事项的细节上花太多时间，但我们从一些事例中，仍然不难看出他善于见微知著、大气中显精细的

特点。比如，他提出修建职工住宅时要安装好水管、煤气管道，还要考虑职工的洗澡问题，以提高职工生活的舒适度；他对“桂林一个小化肥厂，就把整个桂林山水弄脏了，桂林山水的倒影都看不见了”的状况很痛心，提出要有人抓这件事；他对搞好黄山旅游提出了不少非常具体的建议，包括“搞些好的竹编工艺品”，“搞一套黄山风景明信片”；还建议祁门红茶要弄成一二两一包的来出售，“包装搞漂亮些”，游客好带回家作纪念；等等。

据一些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过的人回忆，邓小平善于在作出大的决定后“大胆放手”，“不作具体干预”，“不多讲具体方法”，让下属充分发挥智慧、施展才干。按照曾担任过中组部部长的陈野生的说法是：“既抓得紧，又放得开。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，他抓得很紧；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，他又放得开手。”这似乎跟他对“精雕细刻”“深入细致”地做工作的倡导和要求有点矛盾。其实不然。邓小平在工作中是把“举轻若重”与“举重若轻”两种工作风格有机结合起来的，关键是视情况相机运用。比如，他晚年常说要“算账”，他的一些重大决策，往往要把一笔又一笔大大小小的“账”精心算好以后才作出。

可以这样说，邓小平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既得益于他那“举重若轻”的战略思考，也得益于他那“举轻若重”的“精雕细刻”“深入细致”的唯实作风。

（摘自2011年第6期《党的文献》）

很多人都知道，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，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朱德在党、国家、军队重要岗位上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决策，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，朱德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，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毛泽东把进京执政比作“赶考”，告诫全党要防止“糖衣炮弹”，要求全党牢记“两个务必”。随着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，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更加艰巨。为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，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克服官僚主义，1949年11月，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工委，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出任书记。他强调执政后纪律检查工

一，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适应长期执政的要求指明了方向。

为了把工作做好，朱德要求每个担任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，要认识这个工作的重要，自己要正派，要奉公守法、以身作则，使自己成为遵守纪律、服从组织、团结群众的模范。“如果你自己做不到这些，人家就不大信服你，你就很不容易去进行工作。既然党和人民要我们做这个工作，我们就不能推诿卸责，否则我们自己也犯了无组织、无纪律的错误。”

朱德担任中央纪委书记前后共5年7个月时间，为加强党的纪律，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，保持党的优良作风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。朱德在毕生奋斗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范，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。正如康克清所说：“对先行者的最好怀念，当然不是眼泪和誓言，而是怎样脚踏实地地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，把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。”

（摘自2017年第1期《党史文苑》，原标题为《朱德：新中国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》）

新中国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

□ 詹福满 赵林詹



宋任穷两改横幅

□ 卢建云

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宋任穷兼任云南军区政委。云南起义的部队先称暂编十二军、十三军。通过民主运动，他们要求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。军区决定将他们与人民解放军十二军、十三军合编，即四个军合编为两个军。开会那天，全体官兵在志丹体育场集合。场中悬挂着巨幅标语：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暂编十二、十三军改编大会”。首先登上主席台的宋任穷一看觉得不妥，立即要布置会场的同志把“改编”改成“合编”。这天

晚上开晚会，他看到“部队合编欢迎晚会”的大横幅又说不要，马上又叫工作人员将“欢迎”二字改成“联欢”。“改编”跟“合编”、“欢迎”跟“联欢”意思都差不多，您为什么非要改写不可呢？宋任穷很严肃地说：“共产党人说话、做事、写文章，都要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。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，居领导地位，尤其要注重统战政策，团结党外人士。你们想想吧，‘改编’和‘欢迎’，这都表明我们是主动者，

起义部队是被动者。事实上，云南起义部队主动起义，在昆明保卫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是顺历史潮流之举，这能分出个主客吗？把‘改编’和‘欢迎’改成‘合编’跟‘联欢’就彼此一样，没有主客之分了，这样合乎事实，才使起义部队心欢、眼悦，有利于团结战斗。”

宋任穷的两改横幅，留下了一则令人深思、获益无穷的统战佳话。

（摘自1995年第8期《秘书之友》）

怀念我的父亲滕代远

□ 滕久昕

日子里，父母亲经常来信，勉励我在草原上扎根，好好经受锻炼。父亲在信中教育我：“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，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，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。”

1970年，我来到人民军队这所大学，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。1973年6月，因北京修建地下铁道，我所在的部队整编后，将我从湖北鄖阳调回北京。部队首长知道父亲身体不好，身边没有一个孩子，我又是最小的儿子，特意给我几天假回家看看。那天回到家，父亲见到我特别高兴，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。我望着父亲清瘦的面庞，心情难以平静。他老人家的头发白了，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样好了。父亲问我什么时候去新单位报到，我说：“部队首长给了几天假，在家休息两天就去报到。”父亲不同意，他说：“可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，也不要休什么假，一天也不要，半天都不要！你要听我的话。”我按照他的要求第二天就去新单位报到了。

一天星期六，部队集中进行学习，我正在班里和战友们一起学习时，通信员叫我去连部一下。一进连部，只见父亲的警卫秘书杨新国和部队指导员谈话。我感到很惊奇，忙问什么事情。杨秘书笑着说：“首长想你了，来工地看看你。”“在哪儿呢？”我问。“就在外面车里。”杨秘书说。我向指导员请了假，回到宿舍换了军装，急忙赶到院子外边，老远就看见父亲坐的红旗牌轿车停在院墙外，司机和警卫员站在车外。我钻进轿车见到父亲，忙说：“爸爸，您怎么来啦？”父亲也很激动地说：“你妈妈又

出差啦！我想你啊。”“走吧，我和您回家。”父亲说：“向连队请假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放心吧，我请假了。”坐在车上，我心里很难受。父亲已经69岁了，身边除了母亲，就是工作人员。母亲在铁路局工作很忙，经常到下属单位出差。父亲一定感到很寂寞，才作出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。回到家，他详细地询问我现在的学习和工作情况，部队的教育和施工情况，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。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向他全部道出，父亲听了感到很满意。第二天早饭后，他郑重地对我说：“你回去吧，好好工作。”我虽然感到不理解，也不情愿，但这毕竟是父亲的话，必须照办。

对于我犯的错误，父亲并非每次都能原谅，有时他发起脾气来还真让我紧张半天。记得是在1973年9月，中共十大刚刚结束，父亲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。我在离北京市区约30公里远的昌平参加铁道兵教导队集训。因为训练紧张，考核课目比较多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我请了假，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到城里，见到父亲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，一晃就到了星期日下午。按照规定，我必须在周日晚饭点名前归队，否则就违反了军纪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向站稳秘书求助，想用父亲的汽车送我一趟。工作人员知道我的难处，决定请司机李开志送我归队。为了不让父亲知道，汽车停在了大门外面。

这是我头一次因私事使用父亲的专车，没想到还是让父亲知道了，他严厉地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。不

久，我再次回家时，父亲把我单独叫到一边，口气相当严厉：“你胆子真不小，竟敢坐我的车！”他还说：“干部子弟不允许有优越感，你把我的话全忘了吗？”望着父亲严肃的面孔，我紧张得手心直出冷汗，恨不得地上有条缝，马上钻进去躲一下才好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赶忙向他承认了错误。“你给我听清楚，以后不许坐我的车！”父亲以这句话结束了批评。我回答“是”，然后灰溜溜地退了出去。不仅对我如此，几个哥哥从部队探亲回家，从来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。有时东西带多了，也是我骑自行车去车站接他们，从未因私事用过父亲的汽车。

父亲不仅对我要求严格，自己也是以身作则。他衣着简朴，除了为出国访问而置办的几套像样的衣服外，上班就穿铁路制服，平时在家穿粗布衣服。衬衣、睡衣破了，不愿买新的，让母亲补一下再穿。他平时的伙食很简单，炒萝卜丝和辣子豆腐是他的最爱。他喜欢吃粗粮，每天一个小窝头。父亲不抽烟，也很少喝酒，他要求我们不吸烟，家里几个孩子都是男孩，至今没有有一个吸烟的。我们家新中国成立后住在东城区煤渣胡同的一个院子里，旁边紧挨着一家汽车修理厂，时常听到工厂的噪声。这所房屋破旧了，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，他始终不同意，一直住到病逝。父亲身患重病后，购买的进补药品都是自己出钱，从不让公家报销。而今我深深感到，这不仅仅是家教严，更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。他的言传身教，对我们全家起了很大作用，

几位哥嫂都继承了艰苦朴素、勤俭持家的好作风。

1974年11月中旬，父亲患肺炎病重住进了位于东单北京医院。尽管从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治疗，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，父亲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抗争。当时，几个哥哥都不在身边，唯独我一个人从湖北调回北京一年多时间。我们部队承担着北京地下铁道施工的繁重任务，我平时也很少回家看他。我意识到父亲身边不能没有亲人的照顾，于是向部队首长请了假，急急忙忙赶到北京医院。

我推开病房的大门，见到父亲坐在沙发上。我上前一步，立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，他略显惊奇地望着我，头在慢慢地摇动。我端详着他憔悴的面容，脸色略显苍白，眼睛都不能完全睁开了，说话吐字不清晰，语言表达也很困难。见到父亲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，我傻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。

在医院治疗期间，父亲经常让我陪他在走廊里散步。他一只手持着拐杖，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。看着70岁的老父亲心力交瘁的样子，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难受。可他自己全然不顾，经常听广播、看电视，文件一送来就立刻让我读给他听。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觉悟，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发生的事情。只要有空，父亲就叫我去帮助医护人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我经常去帮助医护人员做事，例如从电梯里装卸氧气瓶，刷厕所和浴盆，擦地板，收拾被褥，帮助护士粘药袋、搓棉签，还有煎中药、打开水、退送餐具等。看到有事

要做，父亲只要用手中的拐杖一指，我就马上过去帮忙。后来慢慢习惯了，不用他的拐杖指，我也能主动找活干。父亲看到后，自然十分高兴。

11月30日，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。那天下午，父亲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宋一平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，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，有人名，还有地名，我在旁边听着也入了神。

晚上下班后，母亲来医院看望父亲。父亲的情绪仍然很激动，大概还在讲着下午的事情，可惜的是，我们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。

后来，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，究竟是什么字，我们也不懂。母亲劝他不要着急，慢慢写。突然啪的一声，铅笔尖折断了，我急忙换上另一支铅笔，重新翻过一张纸，请他把字写大一些。父亲好像听懂了我的意思，不再着急了。铅笔下显出的字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些，原来是“服务”两个字。

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这正是父亲对我们的一贯要求和希望啊！我用双手捧着这张纸，虽然很轻，但上面的“服务”二字重如千钧。父亲是在嘱咐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我凝视着这两个字，向父亲认真地点点头，轻声对他说：“我们会这样做的，你放心吧！”父亲也点点头，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，抬起头用眼睛看着我。老人家的眼眶湿润了，我的目光又一次被泪水挡住了。

12月1日9时15分，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终年70岁。父亲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，走得这样坦然又这样匆忙。

（摘自2014年第10期《党史博览》）

